

# 毛泽东同志对矛盾特殊性理论的重大贡献

涂赞琥 王玄武 刘行森

毛泽东同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他在理论上的贡献是多方面的,而在哲学方面关于矛盾特殊性的理论就是众多贡献中的一个。这个具有独创性的贡献,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学习和研究毛泽东同志在这方面的贡献,对于理解和把握毛泽东思想的实质,坚持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领会和执行党的三中全会以来的正确方针和政策,特别是党的六中全会的重要决议和决策,都有重要的意义。

毛泽东同志所以能够对矛盾特殊性理论作出重大的贡献,这同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的特点是紧密联系着的。旧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经济政治的发展极不平衡,各种社会矛盾错综复杂,不仅同西欧一些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完全不同,而且同十月革命前的俄国也有很大的区别。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应当进行何种性质的革命,革命如何进行,政治上采取何种路线、方针,军事上采取何种战略、战术,这些问题在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中不可能找到现成的答案,从十月革命的经验中也不可能找到现成的模式。因此,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认真分析中国经济、政治、军事和文化的特点,以正确认识中国的国情,把握中国革命的特殊规律,制定符合中国实际的路线、方针、战略、策略,就成为决定中国革命成败的关键问题。

然而,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者,对唯物辩证法一窍不通,不了解分析矛盾特殊性、认识中国社会特点的极端重要性。他们不是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分析中国社会矛盾的特点,得出正确的结论,作为行动的指南,而是照搬照抄马克思列宁主义书本上的个别词句和外国经验,盲目地执行共产国际的决议,不去研究这些词句、经验和决议是否合乎中国的实际情况。因此,他们在政治路线、军事路线和组织路线上,都犯了一系列极为严重的错误,给中国革命造成了极大的损失。

毛泽东同志同否认矛盾特殊性的左倾教条主义作了坚决斗争。他始终坚持矛盾普遍性和矛盾特殊性相结合的原理,强调必须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认真分析中国社会的特殊性,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与具体实践结合起来。

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都曾论述过认识矛盾特殊性的重要性。马克思在批判黑格尔时指出:不仅要揭露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实际存在的矛盾,而且要“从它们的特殊意义上来把握它们。”要“把握特殊对象的特殊逻辑。”<sup>①</sup>即把握特殊对象的特殊矛盾、特殊规律。马克思恩格斯通过对资本主义社会矛盾特殊性的分析,揭示了资本主义必然灭亡和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客观规律,为无产阶级革命奠定了理论基础。列宁在批判“左派”共产主义者时进一步指出:马克思主义的最本质的东西、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就在于“具体地分析具体的情况。”<sup>②</sup>亦即具体地分析矛盾的特殊性。列宁以这个思想作指导,深入分析了帝国主义的基本特征,发

现了帝国主义各国之间经济政治发展的不平衡的规律，提出了社会主义革命可以在一国或数国首先胜利的理论，领导俄国人民取得了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

毛泽东同志进一步发挥了上述思想，他从认识的基础、秩序、目的各个方面，对于认识矛盾特殊性的极端重要性，作了理论上的论证。

从认识的基础看，只有认识矛盾的特殊性，把握特定事物的质，才可能认识事物。人们认识事物，首先就是认识一事物区别于他事物的特殊的质，而世界上的事物之所以具有自己的特殊的质，彼此千差万别，就是由于事物内部所包含的矛盾各有其特殊性。因此，认识矛盾的特殊性，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它是认识事物的基础。如果不能区别不同事物的质，把事物的质认识错了，就会导致一系列的错误。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左倾教条主义之所以错误，使革命蒙受损失，就在于他们不承认认识矛盾特殊性的重要性，不去分析中国社会的特殊的性质，对于中国社会的特点、中国革命的特点、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没有正确的认识。

从认识的秩序看，只有认识矛盾的特殊性，才能把一般与特殊辩证地联结起来，使认识不断地深化。从特殊到一般，又从一般到特殊，这是人类认识真理的正常秩序。人们只有首先认识了许多不同事物的特殊的本质，然后才有可能更进一步地进行概括，认识诸种事物的共同本质，这就是从特殊到一般。不首先认识特殊，就不能认识一般。所谓从一般到特殊，就是在认识了事物的共同本质以后，就以这种共同认识为指导，继续研究各种特殊的事物，找出其特殊的本质，从而不断补充、丰富和发展对事物的共同本质的认识。否则，这种共同的认识就会变成枯槁的和僵死的东西。教条主义者完全否认并颠倒了这个秩序。一方面，他们不懂得只有研究矛盾的特殊性，才有可能充分地认识矛盾的普遍性，把一般原理看成先于特殊而凭空出现的东西；另一方面，他们又不懂得从一般到特殊的道理，把一般原理看成是包医百病的灵丹妙药，拒绝对于具体事物做任何艰苦的研究工作。

从认识的目的看，只有认识矛盾的特殊性，才能找出正确解决矛盾的方法，有效地改造世界。解决矛盾的正确方法是由矛盾的性质和情况决定的。矛盾的性质不同，解决矛盾的方法也就不同。用不同的方法去解决不同的矛盾，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必须严格地遵守的一个原则。教条主义者不遵守这个原则，他们不是在认识矛盾特殊性的基础上，采用正确的解决矛盾的方法，而是用一种公式到处硬套，这就只能使革命遭受挫折。

毛泽东同志不仅论证了认识矛盾特殊性的重要意义，而且具体阐明了矛盾特殊性的种种情形，告诉我们怎样对客观事物的矛盾特殊性进行科学的分析。

首先，各种物质运动形式中的矛盾，都带特殊性。人的认识物质，就是认识物质的运动形式。对于每一运动形式，必须注意它和其它运动形式的共同点，但是尤其重要的，则是必须注意它的特殊点。因为任何运动形式都有它的特殊矛盾和特殊本质，如果不分析矛盾的特殊性，就无从确定一事物区别于他事物的特殊的本质，就无从发现事物运动发展的特殊的原因，或特殊的根据。

毛泽东同志把矛盾特殊性的理论运用于研究中国革命，指出中国革命是在中国社会这个特殊环境中发生的，因此，指导中国革命的方针和策略，必须符合中国的社会性质和中国的国情。他说：“认清中国社会的性质，就是说，认清中国的国情，乃是认清一切革命问题的基本的根据。”<sup>⑥</sup>教条主义者不懂得这个道理。他们离开中国的国情，混淆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一定界限，主观地急于要超过民主革命，主张整个地反对资产阶级以上层小资产阶级，把反资产阶级和反帝反封建并列。毛泽东同志批判了左倾教条主义的这种错误观点。

他从中国的历史状况和社会状况出发，深刻研究中国革命的特点和中国革命的规律，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的思想，创立了无产阶级领导的，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他指出，既然中国是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中国革命的对象只能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革命的任务就是为了推翻这两大敌人，革命的动力是以工农为主体的广大人民，革命的性质是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革命的前途，不是建立资本主义社会，而是建立新民主主义社会，并由此前进建立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

领导革命必须从中国的国情出发，搞社会主义建设同样要从我国的国情出发。建国以后，毛泽东同志多次强调，要从中国是一个大农业国这个情况出发，以农业为基础，正确处理重工业同农业、轻工业的关系，充分重视发展农业和轻工业，走出一条适合我国国情的中国工业化的道路。我们过去在经济工作中长期存在的左倾错误的主要原因，就是脱离了我国的国情，超越了实际可能性。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总结了我国建国以来经济工作中的经验教训，逐步确立了一条适合我国情况的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正确道路，为把我国逐步建设成为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提供了可靠的保证。

研究矛盾特殊性，不但要研究每一个大系统的物质运动形式的矛盾的特殊性，而且要研究每一个物质运动形式在其发展长途中的每一个过程和每一个阶段上矛盾的特殊性。因为每一运动形式都是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在这个发展的长途中，根本矛盾的性质虽然没有发生变化，但是根本矛盾以及被根本矛盾所规定和影响的其它各种矛盾，都会发生这样或那样的变化，因而同一事物的发展就区分为若干个不同的过程和不同的阶段。这些不同的过程和阶段都是不同质的，各有其特点或特殊性，因此都必须具体分析，否则就不能认识过程和阶段的本质和特点，就无从认识事物的发展。

我国的民主革命，经历了旧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两个不同的历史时期。新民主主义革命又有五四运动、北伐战争，以及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和人民解放战争等几个不同的发展阶段，这些不同的阶段都有矛盾的特殊性。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后，国民党新军阀对外投降帝国主义，对内以新军阀代替旧军阀，残酷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人民，革命处于低潮。毛泽东同志根据变化了的新形势，在分析我国实际情况和总结革命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工农武装割据，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道路。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以后，毛泽东同志分析了当时政治形势的特点，明确指出帝国主义同中华民族之间的这个根本矛盾，现在特别突出地表现为日本帝国主义和中国人民的矛盾，其它帝国主义同中国人民的矛盾，以及国内的各种矛盾，都降到次要和服从的地位；党的基本策略是要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全国人民的主要任务是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赶走日本侵略者，变中国为独立、自由和领土完整的国家。在抗日战争即将取得最后胜利的时候，毛泽东同志又及时分析了国内政治矛盾的变化，指出抗日战争作为一个历史阶段来说已经过去了，新的情况和任务是国内斗争，是建立新民主主义的国家还是建立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的斗争；用革命的方法，推翻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建立人民民主专政的新中国，就是这个时期党和人民的主要任务。由于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在革命发展的每一个阶段上，都及时地正确地分析了新阶段的矛盾特殊性，并且根据这些分析及时提出了新的斗争任务，规定了新的斗争策略，从而领导全国人民取得了一个又一个新的胜利。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同样由于社会矛盾的变化而分为若干个不同的过程和不同的

阶段，这些不同的过程和阶段所包含的矛盾，同样具有自己的特殊性，因此必须具体分析。从新中国成立到一九五六年，我们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有步骤地实现了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迅速恢复了国民经济并开展了有计划的经济建设，在全国绝大部分地区基本上完成了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一九五六年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指出，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已经基本上建立起来，今后虽然还有阶级斗争，但其根本任务已经是在新的生产关系下面保护和发展生产力；党和国家工作的重点必须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八大的路线，为新时期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指明了方向。但是，由于种种原因，没有坚定不移地实现这个战略转移，八大路线没有在实际工作中贯彻执行，仍在搞以“阶级斗争为纲”，这就完全离开了三大改造基本完成以后的实际情况，忽视了新时期矛盾的特殊性，在工作中犯了左倾错误，给我国社会主义建设造成了不应有的损失。

研究矛盾的特殊性，还必须具体分析矛盾双方的特点，了解其特殊性。毛泽东同志指出：“所谓了解矛盾的各个方面，就是了解它们每一方面各占何等特定的地位，各用何种具体形式和对方发生互相依存又互相矛盾的关系，在互相依存又互相矛盾中，以及依存破裂后，又用何种具体的方法和对方作斗争。”<sup>④</sup>只有这样，才能了解矛盾在其总体上，在其相互联结上的具体特点，才能把握客观事物的本质及其发展的规律性，从而找到解决矛盾的正确方法，达到有效地改造客观世界的目的。

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同志关于中日战争双方的分析，是这种具体分析矛盾双方特点的一个典范。他指出，日本的长处是其战争力量之强，而其短处则在其战争本质的退步性、野蛮性，在其人力、物力之不足，在其国际形势之寡助。中国的短处是战争力量之弱，而其长处则在其战争本质的进步性和正义性，在其是一个大国，在其国际形势之多助。中日矛盾双方的这些特点，规定了和规定着双方一切政治上的政策和军事上的战略战术，规定了和规定着战争的持久性和最后胜利属于中国而不属于日本。由于毛泽东同志对中日矛盾双方的特点作了深入具体的分析，因而就能从总体上正确地把握中日战争并预见其发展进程，作出持久战将具体表现为三个阶段的科学论断。这些分析和结论，为我们党制定抗日战争的战略、战术并夺取最后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在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毛泽东同志分析了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的十大矛盾以及每一矛盾中对立双方的特点，指出在社会主义建设中要处理好重工业和农业、轻工业的关系，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以及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中央和地方，汉族和少数民族，自力更生和学习外国等各种关系。毛泽东同志的这些论述，坚持了对立统一规律，教导我们在社会主义建设中也必须注意分析矛盾。这一指示对于我们当前的经济调整工作和四个现代化的建设，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研究矛盾的特殊性，还必须注意研究矛盾力量的差别性或不平衡性。这种差别性或不平衡性有两种情形：一是主要的矛盾和非主要的矛盾；二是主要的矛盾方面和非主要的矛盾方面。对于矛盾的这两种不平衡情况的研究，是革命政党正确地决定其政治上和军事上的战略战术方针的重要方法之一，是一切共产党人和革命人民都应当注意的。

关于主要矛盾和非主要矛盾的不平衡性问题，毛泽东同志指出：“在复杂的事物发展过程中，有许多的矛盾存在，其中必有一种是主要的矛盾，由于它的存在和发展，规定或影响着其他矛盾的存在和发展。”<sup>⑤</sup>由于主要矛盾规定或影响着其他矛盾的存在和发展，它在事物发展过程中起着决定的作用。因此，研究任何过程，如果是存在着两个以上矛盾的复杂过程，就要用

主要力量去找出主要矛盾。但是，主要矛盾和非主要矛盾又是互相联系、互相作用，并且在一定条件下互相转化的，因此，在抓主要矛盾的同时，对于非主要矛盾也必须给予足够的重视。

教条主义者完全不懂得这些道理。他们既不知道什么叫主要矛盾，更不知道主要矛盾的变化，因而也完全不知道根据主要矛盾及其变化来规定不同时期的革命斗争的主要任务及其策略。当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中日矛盾已开始转变为主要矛盾时，他们竟对此视而不见，仍在鼓吹所谓中国革命的最危险的敌人是中间派别，认为当时“中国政治形势的中心的中心，是反革命与革命的决死斗争。”因而仍在推行红军夺取中心城市和在白区普遍实行武装工农、各企业总罢工等许多冒险主张，而不去组织抗日统一战线，在斗争任务和斗争策略上都犯了严重错误。毛泽东同志同这种左倾教条主义思想作了坚决斗争，始终坚持把主要矛盾的理论运用于指导中国革命。每当革命发展的转折时期，他总是不失时机地预见到主要矛盾的变化，并根据这种变化及时提出了新的斗争任务和斗争策略，从而领导全国人民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胜利。在政治方面，毛泽东同志运用主要矛盾的理论，提出“不要四面出击”，要集中一切力量“反对当前的主要敌人”的策略原则。他根据中国社会的特殊性质，把中国资产阶级区分为民族资产阶级和官僚买办资产阶级两个部分，对他们采取了不同的策略，争取了民族资产阶级，孤立了买办资产阶级。不仅如此，毛泽东同志还进一步指出，由于半殖民地的中国是由许多个帝国主义所统治的，这些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造成了中国买办资产阶级的不同派别之间以及各派军阀之间的矛盾。对于敌人内部的这些矛盾，我们完全可以而且必须加以利用，作为反对主要敌人之用。我们党在抗日战争时期，对于英、美派的买办资产阶级，解放战争时期对于反对蒋介石的地方军阀，都采取了分化、争取、团结的政策，从而最大限度地团结了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孤立和打击了当时最主要的敌人，使我们党始终立于不败之地，并最终战胜了强大的敌人。

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善于抓住主要的矛盾，仍然是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一九五六年三大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国内的主要矛盾已不再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而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已成为全国人民的主要任务。由于无视主要矛盾和主要任务的这种变化，在很长时期内，全党全国的工作重点没有转到这方面来，致使我国的经济建设受到严重干扰，没有取得应有的成绩。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扭转了这种情况，决定将全党全国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建设上来，这是完全符合我国现实情况的，是完全正确的。我国历来是一个人口众多、经济落后的大国，直到今天仍然没有完全改变这种落后的面貌。要从根本上改变这种状况，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强国，是一项艰巨而又长期的斗争任务。否认或忽视这项任务，就会偏离主要矛盾和主要任务，而走到邪路上去。

关于主要的矛盾方面和非主要的矛盾方面的不平衡性的问题，毛泽东同志指出：“矛盾着的两方面中，必有一方面是主要的，他方面是次要的。其主要的方面，即所谓矛盾起主导作用的方面。事物的性质，主要地是由取得支配地位的矛盾的主要方面所规定的。”<sup>⑥</sup>由于事物的性质主要地是由矛盾的主要方面所规定的，所以在分析事物的矛盾时，必须注意抓住矛盾的主要方面，分清矛盾双方的主次，这样才能把握事物的本质和主流。但是，主要矛盾方面和非主要矛盾方面又是互相联系、互相作用，并且在一定条件下互相转化的。矛盾的主要方面起了变化，事物的性质也就随着起变化。新旧事物之间的新陈代谢，就是通过这种矛盾地位的互相转化而实现的。毛泽东同志运用这个理论指导革命斗争，分析敌我力量对比，指出

弱小的革命力量在变化着的主客观条件下，能够最终战胜强大的反动力量，由此提出了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著名论断，指明在战略上要藐视一切敌人，在战术上要重视一切敌人。历史的发展，证明毛泽东同志的这些论断是完全正确的。

研究矛盾的特殊性，还必须研究解决矛盾方法的特殊性。不同性质的矛盾，必须用不同的方法去解决。解决矛盾的方法不正确，不符合矛盾的性质和情况，不但不能正确解决矛盾，而且会把事情办糟。毛泽东同志说：“用不同的方法去解决不同的矛盾，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必须严格地遵守的一个原则。”<sup>①</sup>把这个原则运用于政治生活，就要求严格区分和正确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这两类矛盾的性质不同，因而解决的方法也不同。解决敌我矛盾，必须采取专政的方法；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只能运用民主的方法。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对人民内部的民主方面和对反动派的专政方面互相结合起来就是人民民主专政的理论，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但是，在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由于长期执行“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方针，把大量不属于阶级斗争性质的矛盾当作阶级矛盾，把大量的人民内部矛盾当作敌我矛盾去处理，导致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而在十年动乱期间，林彪、江青一伙又抛出所谓“政权就是镇压之权”和“全面专政”的反动谬论，把广大革命干部、知识分子、劳动模范等，统统列入专政的范围。他们完全颠倒了敌我关系，在他们所控制的地方实际上把无产阶级专政篡改成了法西斯专政。这个惨痛的教训是值得吸取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政权，能否正确区分和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这不是一个小问题，而是关系到政权性质的大问题。如果象林彪、江青一伙那样，用专政的办法对待广大人民群众，那就必然会使无产阶级专政变成成为法西斯专政。

当前，坚持用民主和专政两种方法，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社会矛盾，仍然具有迫切的现实意义。一方面，剥削阶级作为阶级消灭以后，虽然阶级矛盾不再是主要矛盾，但是，阶级斗争还将在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在某种条件下还有可能激化，因而对于那些反对社会主义制度、破坏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极少数阶级敌人，还必须实行专政；另一方面，由于林彪、江青一伙的破坏和以往工作中的左的错误，遗留有大量的问题尚未得到解决，大量的人民内部矛盾需待正确处理。因此，我们必须看到两类矛盾还同时存在，必须采取不同的方法去正确地加以处理，从而维护和发展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保证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顺利进行。

毛泽东同志把马列主义和我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具体地分析了我国社会矛盾的复杂特点，走出了一条适合我国国情的中国式的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正确道路，并取得了伟大的成功。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深刻地总结了建国以来正反两方面的经验、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教训，具体地分析了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我国社会矛盾的变化和经济、政治、文化各方面的特点，逐步确立了一条适合我国国情的中国式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正确道路。虽然我们面前还有很多困难，还要经过许多的探索和试验，还要进行长期艰苦的努力，但是，道路已经打通，我们坚信，只要坚定地沿着这条道路前进，我们一定能够逐步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现代化的、高度民主的、高度文明的社会主义强国。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359页。

② 《列宁选集》第4卷，第290页。

③ 《毛泽东选集》，横排版，第2卷，第596页。

④⑤⑥⑦ 《毛泽东选集》，横排版，第1卷，第287、295、297、286页。